

# 第一章 国家利益冲突与中苏大论战的发生

## 一、国家利益：主权国家存在 与发展的核心与始基

有国家以来，便有了国家利益。近代主权国家出现之后，国家的内涵与外延都有了更为明晰的规定，人们对国家利益的主观认知也从过去的模糊状态中剥离出来，具有了更加确定的内容。<sup>①</sup> 在国际政治领域，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一词就其基本涵义而言应渊源于欧洲近代出现的“国家理由”（Raison d'état，一译“国家理性”），而 Raison d'état 的广为流行则源于法国红衣主教和政治家黎塞留对付其政敌的一句口头禅，<sup>②</sup> 意即国家本身高于任何道德和法律准则。<sup>③</sup> 这一原则曾被当作近现代国

<sup>①</sup> 国家利益与国家是不是相伴而生，这是一个颇具争论性的话题。学术界有关国家利益问题的讨论可参见陈汉文：《在国际舞台上》（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张季良主编：《国际关系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黄硕风：《大较量：国力、球力论》（湖南出版社 1992 年版）[美]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的政治》（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等著作中相关章节的论述。本书作者认为，在讨论“国家利益”这一概念时，不仅要用发展的观点去看待“国家”也要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国家利益”。

据考证，该术语由拉丁文“ratio stasis”演化而来，最早在近现代意义上使用该词的是意大利作家圭恰尔迪尼。参见邓正来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33—634 页。

参见 [英] 戈尔·布思主编：《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 第五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66 页。

家主权理论的一部分而被广泛采用，尤其是被马基雅维利和黑格尔大肆宣扬之后。由于强调国家利益的至上性，*Raison d'état* 内含着与国际法准则及宪政原则冲突的一面。因此，一般情况下，人们更喜欢用 *National Interest* 来指称国际政治学中的“国家利益”一词。<sup>①</sup> 虽然这一概念非常抽象，但它却是一个主权国家存续与发展的内在需求，是其整体国家战略与外交总战略的基本依托。作为国际舞台上的行为主体，每一国家自然有其特殊的利益追求，这样便形成了各种相互不同乃至彼此冲突的国家利益。国家的行为是以追求国家利益为转移的，每个国家都要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采取行动以维护其自身利益。国家作为一个由领土、居民、主权构成的独立实体，它首先要维护自己的生存与延续，即保证自己作为拥有主权的国家实体的存在。如果国家实体被吞并或消灭，主体也就不复存在了。在国家利益的需求中，生存和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内在联系。存在是发展的基础，而发展则是为了更好地生存。没有了发展的存在便是停滞，便意味着死亡。就其本质而论，生存是一个政治和军事问题，发展是一个社会和经济问题。当国家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的时候，国家的生存问题便会被置于首要地位，这时它就必须将国家相当一部分资源用于增强国防能力，这势必会影响其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却是必需的；而当国家的生存环境好转之后，直接威胁国家安全的力量弱化了，这时它就会把发展社会经济作

<sup>①</sup> 如 A. T. Mahan (*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 Present and Futur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11), Charles A. Beard (*The Idea of National Interest: An Analytical Stud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hicago, Quadrangle Paperbacks, 1966),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5th ed. rev. New York Knopf, 1978),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等人在其著作中广泛使用的大都是 *National Interest* 一词。

为第一要务，而社会经济的繁荣反过来又会大大增强国家存续的能力。

国家利益虽然表面上看来带有很大的虚拟性，但它并不是人们随意杜撰出来的纯粹的抽象概念，而是在一个主权国家形成之日就存在着的一种自然的、客观的内在需要。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不论其领土大小、人口多寡、社会制度如何以及实力强弱，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各国政府总是把对国家利益的追求放在首要位置。同时，任何一个国家对生存和发展的需求都是多层次的，因而也是复杂的，这些需求至少包括民族生存、政治承认、经济效益、社会发展与稳定、国际地位及其对世界的贡献等诸多方面，而这些需求则要在国家生活的不同领域来实现，这就决定了国家利益结构体系的复杂性，因而人们也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对国家利益作出各种不同的概括。如从空间上把国家利益划分为国内利益和外部利益，或从时间上把国家利益看成是长远利益、暂时利益和潜在利益的统一等等。其中为大多数学者最为普遍接受的便是将国家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作为国家利益三个要素的观点。<sup>①</sup>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与实现国家利益，就需要制定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最有利于维护与实现国家利益的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和国际总战略。国家利益是制定国家总体战略的基本依托，而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总体战略则是该时期国家利益的集中表现。换句话说，国家利益是确定国家战略目标的基础，而国家战略的任务就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满足国家利益的

关于国家利益的不同划分，可参见张季良主编：《国际关系学概论》，第54—58页；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第116—141页；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第20—25页；[波]约瑟夫·库库尔卡：《国际关系理论问题》，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43—247页。

需要。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战略与国际战略<sup>①</sup>便是该国国家总战略的对内与对外两大部分。前者主要是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所采取的国内总体发展战略，而后者则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而制定的对外总战略。前者所要解决的是在国内社会经济政治发展过程中，如何最大程度地选择并体现国家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的问题，而后者所要解决的则是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战略和地缘战略才能在国际社会中更大程度地维护和实现国家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的问题。在实践中，二者又往往是相辅相成的。

就某个具体国家而言，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其基本利益是相对固定的，不会轻易发生变化。因为国家利益根源于国家社会生产水平和外部的环境所提出的要求，在社会生产水平和外部环境没有重大改变的情况下，国家利益也会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只有当国家的内部发展或外部环境发生大的变化时，其客观的国家利

关于“国际战略”的涵义，在理解上也存在着分歧，但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国家为行为主体，一类把国际社会本身作为国际战略的主体。参见〔德〕赫尔穆特·施密特：《西方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美〕约翰·柯林斯：《大战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本第42—43页。陈忠经：《国际战略问题》时事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张季良主编：《国际关系学概论》，第73—74页。另参见王家福在其《国际战略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中对国际战略的探讨。此处取第一义。本书作者曾在一篇相关文章中这样表述国际战略的基本涵义：“国际政治学中所说的国际战略是同具体的国家和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追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其基本的和核心的利益驱动。某一国家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然会有一个基于对国际时空格局判断而形成的针对这一格局的总的对外行动纲领而制定的一整套的原则计划，这就是该国在该时期的国际战略。国际战略也被称为国家的对外总战略或全球战略，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乃至社会心理的诸多因素。（参见蒲国良：《过渡时期俄罗斯的地缘战略选择》一文 载李景治主编：《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益目标才会发生重大变化。不过，虽然国家利益本身具有客观性，但是，由于价值观念、知识结构、个人修养、认识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人们对国家利益的解释也往往会千差万别。因此，即便一个国家客观的国家利益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国内政治权力的更迭仍然可能导致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与国际总战略的重大调整。因为施政者发生了变化。如果新的施政者对国家利益的主观判断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他就完全有可能根据自己对国家利益的认知重新布署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与国际总战略。如斯大林逝世前后的苏联与毛泽东逝世前后的中国。就客观的国家利益而言，无论是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的苏联，还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的中国，都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发生变化的是最高政治领导层以及新旧决策者对国家利益及其实现方式的判断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样，即便是同样的决策者，如果他对国家利益的主观判断发生了重大变化，也会对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和国际总战略进行大幅度的调整。20 世纪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初斯大林对苏联国家发展战略的大调整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毛泽东对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大调整都属于此种情况。只有在对国家利益做出正确判断的基础上才能确立正确的国家战略目标，如果对国家利益判断出现错误，那么难免会制定错误的国家战略目标。国家战略目标一旦确立，它必然会成为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的主要任务。在主要任务完成过程中，随着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它又会反过来对未来的国家利益判断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任何国家的国家战略都应以自己国家在特定时期的利益结构的变化作为主要依据而制定和实施。当然，由于主观上对利益结构的判断可能发生误差，并不是每个国家的国家战略都会获得成功，但有效而成功的战略调整则一定要适合本国利益结构的变化。

要有效地实现国家利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国家利益实现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在这里，构成国家利益的各要素、各层次之间存在着盘根错节的关系，在某一特定时期里，它们之间甚至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国家利益的实现，既要照顾到各要素、各层次之间的平衡，同时又需要分清它们之间的主次、先后和轻重关系。在国家利益的构成中，一定时期里起主导作用的要素就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准确把握住核心利益，是有效实现国家利益的关键。国家的核心利益是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安全利益一直被作为国家的核心利益，这是由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及当时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结构的基本判断决定的。而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家完成了工作重点的转移，经济利益被置于核心利益的地位，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其次，国家利益的实现，往往需要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等诸手段的综合运用。而这些手段的运用，既要有实力，还要靠谋略。国家实力是国家利益得以维护与实现的最基本的条件。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任何实力基础，再高明的策略大师也玩不出太多的花样来。所谓“空城计”、“空手道”，都不过是暂时的应变之术，到头来终需要坚强的实力作后盾。正如毛泽东所说，“实力政策、实力地位，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在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sup>①</sup>当然，国家实力既有表现为物质形态的硬件，如人口、面积、工业、金融、军事，包括一定程度上的文化等

<sup>①</sup> 毛泽东 1960年7月同李富春、陈正人、薄一波的谈话，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年版，第872页。

等，也有表现于观念形态的软件，如文化传统、历史、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社会凝聚力等等。谋略需要一定的实力做基础，但“谋”得好坏与国家的实力又往往是不完全对称的。尤其是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实力的运用会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国家实力的对比并不能完全决定国际竞争和冲突的结果。一个小国、弱国如果遇到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他有可能在特定的条件下充分调动一切现实的与潜在的力量并把这一力量发挥到极至，从而为该国争得超乎其国力之上的荣耀。如新加坡在李光耀的领导下，一个弹丸之地转眼间成了举世瞩目的国际性的贸易中心。尼克松在谈到李的成功时甚至曾颇为遗憾地表示：如果他是处于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国家，就可能成为像丘吉尔、迪士累利或格莱斯顿那样的世界性人物。<sup>①</sup> 同样，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如果谋划失当，其实力的运用便会大打折扣。美国在二战后一段时期的实力不可谓不强，但是却接连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失去主动，其中的一个原因即在于此。谋略是实力得以有效发挥作用的灵魂，如果没有高明的谋略，现有的实力就不可能充分地发挥，更不用说潜在实力的巧妙运用了。只有协调各种战略手段的运用，才能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最优化地维护与实现国家利益，否则，各种实力和手段的作用就可能相互抵消，最终反而会阻碍国家利益的实现甚至危及国家利益。

各国都以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为根本目标，而不同国家的利益结构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甚至可能差别很大。这样，在各国获取各自的国家利益的时候，就会出现彼此利益相互交错的情

参 见 [美] 理查德·尼克松：《领导者》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3年版，第 357 页

况，在某些地方可能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而在别的地方则可能利益相左甚至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一旦国家间的利益发生冲突，如果解决冲突的手段和方式比较地多元化，双方回旋的空间较大，冲突的可控性较强，冲突的烈度就会比较低，相反，冲突的烈度就会比较高。反过来，国家间冲突的烈度越大，可控性就会越小，回旋的余地就会越小，而解决的手段也往往会趋于激烈和单一。一旦冲突发展到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解决的地步，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就完全变成了一种零和游戏。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凡是被迫卷入战争旋涡的国家，它当时的国家利益就是要赢得战争，已没有了第二条可供选择的道路。

自民族国家于近代形成于欧洲之后，主权国家便成了国际社会生活的主体，民族国家利益的冲突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激烈。从 19 世纪末开始，这种激烈的冲突首先在欧洲国家之间展开，冲突烈度越来越强，直至演变成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20 世纪是一个主权国家纷纷涌现的时代。传统的帝国分崩离析，在其废墟上出现了一个直至若干个新的民族国家，一批接一批的原殖民地国家也纷纷挣脱旧的宗主国的束缚争得了主权。伴随主权国家大量涌现的一大国际政治景观，便是主权国家之间大规模、高烈度的冲突与争斗。最初，解决国家利益冲突的手段相当单一和刚性，可控性极低，结果也基本上全是零和游戏。亦即战争被看成是解决冲突的最终的和惟一有效的途径。一旦发生利益冲突，双方便在战场上一决高低，战后的利益格局完全取决于胜利者的意志。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和平被看成是两次战争之间短暂的喘息，谈判往往也被看成是积蓄力量、卷土重来的一种手段。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时代，这一观念基本上主导着国际政治的主流。两极格局时期，军事对抗仍然是国际斗争的

主要形式，各国所面临的主要威胁依旧来自军事，这就迫使各国仍然不得不把军事安全作为各自的首要利益选择，人类社会始终在随时可能爆发战争与防止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之间徘徊。但也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期，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苦难，经过长期的冲突与磨合，国家间冲突的烈度开始出现缓和的趋势，解决冲突的手段也日益多元化，人们的观念也从零和游戏逐渐转向双赢或多赢。这种趋势在冷战后时代已更趋明朗，尽管世界仍然存在着不少地区热点和高烈度的国家间冲突。

## 二、20 世纪 50—60 年代中苏两国 对国家利益的不同诉求

1917 年，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在地球的一角，在一个显然已被战争拖垮并且眼看就要拖死的沙俄帝国的母体上，如凤凰涅槃一样奇迹般地诞生了一个崭新的国家、崭新的制度——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22 年，以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为主体，联合其他几个相邻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这个红色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战胜了饥饿，战胜了封锁，战胜了内乱和外患，从一个幼弱的政权最终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不得不反过头来求助于她的力量来共同对付希特勒，结果是整个东欧脱离了西方阵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已经跃升为雄视欧洲，与世界头号霸主美国相抗衡的第二大强国，成了冷战格局中两极中的一极的核心力量。

在从立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 20 多年间，苏联始终处于被敌对力量封锁和包围的孤岛状态，维护政权的生存始终是

其国家利益的核心，也就是说，国家的安全利益在这一时期一直被置于超越于国家利益结构中其他要素之上的首要的地位。在列宁去世后的权力角逐中，斯大林先后击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基于对苏联的国家利益考量及对国际政治局势及国内政治经济及社会态势的分析，斯大林把加速发展战略确定为苏联的国家总战略。他认为，苏联处于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随时都可能受到攻击，战争的阴云始终笼罩着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与苏联政府的迫切任务就是在战争到来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击败敌人的进攻。为了积蓄这种力量，斯大林确定，在内部，必须调动一切力量加速发展自己；在外部，则要尽可能地把对苏联的威胁减小到最低限度。斯大林在与反对派论战时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论点就是：“决不能减低速度”。“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 50—100 年。我们应当在 10 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sup>①</sup>为了集中利用一切资源加速发展苏联的国力，斯大林建立起了过度集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体制。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加速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与此相适应，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实行了过度的集权，任何不同的声音都被认为有碍于经济的加速发展从而危及国家利益而被严令禁止直至无情镇压。为了争得对苏联加速发展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斯大林的国际战略的基本目标就是：在空间上尽一切可能拓展缓冲地带，在时间上尽一切可能推迟战争的爆发。为此，在东方，苏联全力支持外蒙古独立建国，并因此不惜与中国政府翻脸。不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37—38 页。

仅如此，苏联还尽一切可能维护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必要时也不惜动用武力。在西方，为了缓解法西斯德国的威胁，苏联发动了对芬兰的战争，并与希特勒德国合谋瓜分了波兰等国领土。斯大林还把共产国际变成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纳入苏联的国际战略，让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都为保卫苏联政权服务。斯大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赢得了虽然畸形发展但仍足够强大的苏联，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美英等联手打败法西斯奠定了国力基础。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为契机，苏联终于摆脱了长期的孤岛状态，生存的威胁被大大降低了。但是，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对苏联国家利益的基本判断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斯大林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只是新的一次世界大战到来之前的暂时的和平，资本主义制度的总体危机并没有结束，为了摆脱自身的危机，资本主义必然会走上新的战争之路。而苏联则必须为赢得下一次的战争而积极备战。也就是说，在斯大林看来，苏联虽然打赢了反法西斯战争，虽然在国家实力上有了明显的提升，虽然生存空间空前扩大了，但苏联仍然没有摆脱生存的威胁，安全利益仍然处于苏联国家利益的首位。正如斯大林对印度大使所说的那样：苏联只关心自身的安全和建立一条由对苏友好国家组成的缓冲带。<sup>①</sup> 基于这一认识和判断，斯大林错失了其有生之年改革苏维埃制度的最后一次机会，而战后国内一度涌动的改革潮流也随着沃兹涅先斯基与库兹涅佐夫等人的先后被整肃而再次归于沉寂。结果，战前为积极备战而建立起来的斯大林模式在战后不

参见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34 页

仅没有进行及时的改革，反而被更进一步凝固化和神化了。

基于对战后苏联国家利益的基本判断，斯大林对战前苏联所采用的社会发展战略与国际战略持完全的肯定态度，并要在战后继续下去。<sup>①</sup> 斯大林认为，战争是解决两种制度冲突的必然和最后手段，战后的和平只是战争以一种特殊的形态的延续。新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而战争则是一种零和游戏。苏联的国家利益要求它必须打赢下一场战争，而未来的那场战争极有可能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总决战。还在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前夕，斯大林就说过，这次战争与以往不同的地方在于，无论谁占领了一片土地，他都会在那里强制推行自己的社会制度。凡是他的军队所能到达之处，他都会这样做，不可能有例外的情况<sup>②</sup>。斯大林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它决定了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包括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全面危机。这种危机的基础，一方面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瓦解日益加剧，另一方面是脱离资本主义的国家——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实力日益增长。<sup>③</sup> 由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兼容性，两种制度、两大阵营的冲突和战争最终将是不可避免的。直到临去世前，斯大林仍然明确表示，要消灭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sup>④</sup> 世界资本主

<sup>①</sup>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用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全面论证了其治国方略的正确性与正当性。参见《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2—484页。

<sup>②</sup> 参见[南]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85页。译文略有改动。

《斯大林文集（1934—1952）》，第620、641—642页。

<sup>④</sup> 《斯大林文集（1934—1952）》，第625页。

义总危机 在它的第一阶段上产生了社会主义的苏联 在它的第二阶段上,又在欧洲和亚洲产生了一批人民民主国家并和苏联一起形成了统一的和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sup>①</sup>按照这一逻辑推演下去,新的世界大战到来之时永远地消灭帝国主义并不是不可能的。<sup>②</sup>还在 1946 年初的群众集会上 斯大林就声言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证明了苏联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的优胜。正所谓“胜利者是不受裁判的” 斯大林一言九鼎 任何怀疑和试图改变苏联制度的努力都是不允许的。于是战前的备战模式被延续了下来,苏联整个社会的全部资源依然被凝聚在加速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中轴上 其他一切领域仍被置于附着的地位 消费品的生产必须让位于改进军队装备。在斯大林看来,这是苏联加速发展,增强国力的最有效的途径。他甚至把苏联的工业化道路与西方英法美工业化道路之间的差别上升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与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路线高度。<sup>③</sup>在国际战略上,斯大林通过雅尔塔体制把苏联获得的势力范围“合法化”和固定化了。在欧洲 苏联把整个东欧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东方,它得到了整个库页岛 成功地使外蒙古从中国版图中彻底分离了出去 占领了日本的北方四岛 还以“三八线”为界把朝鲜半岛的北部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在欧洲与亚洲都进行过拓展势力空间的努力,最典型的当数西线的柏林危机与东线的朝鲜战争。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夺取政权是斯大林的一个意外收获,雅尔塔体制出现了

① 《斯大林文集(1934—1952)》,第 620、641—642 页。

② 据莫洛托夫回忆,斯大林确实曾经做过这样分析,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曾使一个国家摆脱了资本主义的奴役,第二次世界大战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体系,而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一劳永逸地埋葬帝国主义”。参见 [苏] 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新华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09 页。

③ 《斯大林文集(1934—1952)》,第 480 页。

一个巨大的缺口，斯大林成功地把偌大一个中国变成了自己的同盟国、缓冲带与反美前沿阵地。同时，斯大林小心翼翼地处理与世界头号强国的关系，任何的扩张性试探都以不触怒美国为底线，谨慎地维持着冷战格局下的和平。因为在斯大林看来，美苏的任何直接冲突都有可能点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而在没有把握击败对方的情况下，维持现状，与美国分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成果显然是最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的。这便是斯大林晚年对西方强硬而又节制的外交方针的基本的认识论依据。苏中关系不过是斯大林总体国际战略中的一环，是苏联同美国和西方国家打交道中的一张底牌，处理同中国关系的任何举措都是以对苏联国家利益的仔细考量为基线的。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经过一段时间激烈的权力争夺，赫鲁晓夫击败对手，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从马林科夫执政时起，苏联已开始出现校正斯大林路线的趋向，赫鲁晓夫则更是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批判斯大林运动，苏联新领导人开始比较全面地反思斯大林的理论及路线方针政策。

苏联新领导人确认核武器的出现整个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存状态，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在核武时代，战争具有了毁灭人类的性质，一旦核战争爆发，参战的任何一方都不再可能成为胜利者，而任何一个小小的局部战争都有引起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因此，任何战争，即便是普通战争、非核战争，也会变成毁灭性核战争的导火索。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舞台上的反战力量第一次大大超过了战争的力量，社会主义各国与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一起能够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一个完全现实的任务，即防止新的世界大战，保障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赫鲁晓夫认为，现在连美帝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也已变得真正希望和平，也在为和平操心了。苏共新领导

人的结论是 帝国主义用以威胁人类的世界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①基于这一判断 苏联的基本国家利益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基于维护和保障生存的安全利益让位给了旨在迅速改善民生状态的社会经济发展。赫鲁晓夫认为 新的时代是一个两种制度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时代 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必将取代资本主义制度 但这一过程将不再通过战争 而是通过和平竞赛来实现和平的过渡。苏联要在这个和平竞赛过程中保持优势 就必须恢复苏维埃制度的活力 迅速发展生产 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重估苏联国家利益，必然导致苏联国家战略的大调整。在社会发展战略方面，赫鲁晓夫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发起了全面否定斯大林体制的运动，政治上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经济上试图改革过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体制，思想领域批判教条主义，文化上倡导“解冻”，长期处于沉闷压抑状态的苏联社会生活开始呈现出某种程度的生机与活力。在国际战略方面，苏联领导人把和平共处看成是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最高原则，是“整个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是“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帮助国际革命工人运动达到其基本的阶级目标的最好的方法”。在赫鲁晓夫看来，只要通过全面彻底的裁军，通过苏美两个核大国的联合，就可以防止战争的爆发，实现和平，就能够实现一个“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与斯大林时期的内敛谨慎不同，赫鲁晓夫已把苏联置于在国际舞台上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苏联的国家利益

①《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速记稿》第1卷，莫斯科1956年版，第37页；参见《赫鲁晓夫言论》，第五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40页。

也开始越出传统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范围而向全球漫溢。这实际上是迈出了战后美苏全球争霸的关键性一步。在当时两极冷战格局中，东西方势力呈两大阵营分布，而苏联又是社会主义阵营之首，为了把阵营内部各国纳入到苏联新的国际战略中去，它必然要求其他国家与苏联一样实行步调一致的战略调整。中苏两国国家利益的剧烈碰撞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

正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奇迹般地生长出一个苏联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炮火的余音中，在世界的东方，一个饱受帝国主义蹂躏、被西方列强讥讽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又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立国之初，新政权面临着严峻而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就国内而言，中国的基本国情就是毛泽东所形象地概括的“一张白纸”、“一穷二白”。<sup>①</sup>用毛泽东的话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sup>②</sup>而这时的美苏两大强国都已掌握了像原子弹、氢弹这样的毁灭性武器。在饱受长期战乱之后，百废待举的中国迫切需要的是休养生息，是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而这时新解放区的土改还没有开始，还有大量的土匪及国民党残余势力尚待肃清，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则随时有可能反攻大陆。新政权所面临的国际大背景则是美苏冷战格局已基本成型，双方意识形态对立的气氛极其浓重。这一国际政治背景无疑增添了中国政府争取外部世界承认的难度，因为新政府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这一政权性质本身在当时的冷战氛围中就已在某

①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44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种程度上给自己定了位。同时，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面对的还有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以及强权政治所造成的既定的极为不利的政治生态环境。像任何一个新生政权一样，国家安全利益在立国之初的国家利益结构中居于首要的和核心的地位。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地缘政治条件下，对于一个历经三代政府，打了 100 多年仗、付出几千万人生命代价才换来民族独立的新生政权而言，如何能够把对国家利益的损害减小到最低限度，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稳住阵脚，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如何能够迅速求得国家的发展和强大，便是最大的国家利益。

基于上述基本判断并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的社会发展战略进行了类似于 20 世纪 20—30 年代苏联的工业化模式：为了调动有限的国内资源快速发展重工业，中国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起来 与经济体制的集权相适应 政治权力也越来越集中 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也日趋单一化，其结果，中国几乎是完整地复制了一个斯大林模式，当然在这一过程也加进了中国自己的特色。在国际战略方面，中国的幅员和人口加上它特殊的地缘价值使得新政权成立之初便不期而遇地成了美苏对抗和争夺的一颗重要棋子。在当时的背景下，中国选择中立于美苏之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sup>①</sup> 一方面，

建国前夕，张治中将军曾数次向周恩来和毛泽东建议：中国新的外交政策应避免重蹈国民党政府一面倒的覆辙，实行美苏并重的新政策，既亲苏也亲美，不反美也不反苏 平时美苏并重 战时善意中立 以亲美又亲苏的美苏并重政策来消除美苏对立 使中国成为美苏关系的桥梁 这对中国有利 对美苏有利 对世界和平也有利。因此 新政府在联合苏联时，也应当努力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改善和保持良好关系，这种政策最符合中国的利益。参见余湛邦：《张治中——张治中机要秘书回忆录》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236—237 页。另参见 Chen Jian,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and Chinese’s Entry into the Korean War”, Working Paper, No.1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June 1992, P3.应该说 张治中的想法在当时是有着相当代表性的。其实，中共领导人心里未必不清楚这一点，但作为掌管一个国家最高决策权的政治领导人，他们只能基于现实的判断做出选择。